

辛亥革命后的几个短命政权

〔1911——1949〕

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前 言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复辟帝制的大野心家、大军阀袁世凯和扶废帝上台的小丑张勋，也出现过顽固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统治的北洋军阀各派头子和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独夫民贼蒋介石；但由于他们代表着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违背，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不得不在越来越强大的人民革命洪流中结束了短命的统治。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

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加深认识这条历史规律，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是有帮助的。

我们是文化革命后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本小册

子是我们的毕业实践。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得到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党委和工人师傅的热情指导和教育，特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得还不够，时间仓促，这本小册子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74 年

目 录

一、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1
1. 窃取革命果实	1
2. 独裁和卖国	3
3. 短命的“洪宪皇帝”	10
二、顷刻瓦解的张勋复辟	17
1. 复辟的前奏	17
2. 复辟的丑剧	21
三、更替频繁的军阀政权	26
(一) 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反动统治	27
1. 独裁卖国的段政府	27
2. 五四爱国运动和段祺瑞的垮台	31
3. “打倒孔家店”	33
(二) 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	38
1. 贿选总统、卖国残民	38
2. 人民反直运动和曹、吴的垮台	44
(三)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覆灭	47
1. 张作霖控制下的“执政府”	47
2. 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涨和“执政府”的倒台	51

3. 北伐的胜利进军及北洋军阀的覆灭	53
四、得势一时的蒋家王朝	57
(一) 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蒋家王朝	57
1. 蒋家王朝的建立	57
2. 法西斯独裁统治	62
3. 十年反革命内战	66
4. 投降卖国、破坏抗日	69
(二)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家王朝	72
1. 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72
2. 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	76
3. 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	79
(三) 蒋家王朝的覆灭	81
1. 依靠美帝发动大规模内战	81
2. 蒋介石统治的全面危机	84
3. 蒋家王朝的覆灭	87

一、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

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当权的反动派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袁世凯却违背历史潮流，倒行逆施，在中国复辟帝制；结果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只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就被迫下台，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1. 窃取革命果实

一九一二年春，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决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他就通过夺取军权、进行政治投机、屠杀人民、投靠帝国主义积蓄了反革命政治资本。

袁世凯，河北项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游手好闲，因为叔祖父在清王朝反动军队里当官，他也混进军队，逐步成了大卖国贼李鸿章的“得意门生”。

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受清政府的委派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从而掌握了兵权。同时他又培植了段

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人作为他的反革命骨干。从此，这支军队——“北洋军”就成了袁世凯反革命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支持维新派，暗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告密，出卖维新派，破坏了戊戌变法。袁世凯依靠这次政治投机，成了慈禧太后和清朝权贵荣禄的亲信。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作为山东巡抚，勾结帝国主义武装，血腥镇压义和团，因而又深得帝国主义的赏识。

一九〇一年，李鸿章临死时，推荐袁世凯继承他的卖国事业，这样袁就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宠儿。以后，由于反动派的内部矛盾，袁世凯虽然一度失宠，但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清王朝又起用他作为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一月，孙中山就任了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是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武昌起义之后，清朝政府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国内外反动派就选中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在帝国

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采取反革命两手，一面进行武力镇压，另一面却搞假“和谈”，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妥协退让，以便窃取革命果实。

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压力下，软弱的资产阶级采取妥协的态度，答应只要袁宣布赞成共和，并迫使清朝皇帝退位，就可把政权让给他。袁世凯得到了让权的保证，转而逼迫清室在接受“优待条件”后，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接着孙中山辞职。三月十日，袁世凯由清王朝的大臣摇身一变做了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

就这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开始了北洋军阀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2. 独裁和卖国

袁世凯建立的北京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上台以后，为了加强专制独裁，采取了一系列反革命步骤。

袁世凯在就职前曾虚伪地表示愿行议会政治，宣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并于一九一二年底开始举行了全国选举。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党在南方

还有一些力量，有的领导人更企图搞责任内阁与袁分享权力。他们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积极参加国会选举，并获得多数席位。这是寸权必夺的野心家袁世凯绝不能容忍的。他于一九一三年三月派人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从此，议会政治更成了袁世凯玩弄的工具。

“刺宋案”暴露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极大愤慨。孙中山也识破了袁世凯的阴谋，主张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就一不做二不休，打定主意发动内战，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势力。

袁世凯为了镇压革命，筹划内战经费，一九一三年四月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得到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当时，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善后大借款》签订后，全国各界人民反帝反袁的怒潮汹涌澎湃，使得国会也不敢通过此案。但是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便一意孤行，借口国民党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反对借款，违抗命令，于七月派北洋军大举南下，发动了内战。

这时国民党内部已四分五裂，又不去发动群众，

结果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民主势力就被袁世凯所镇压，北方和南方就都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了。

大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对于权力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在消灭南方各省民主势力后，又立即图谋从临时总统登上正式总统的宝座。

正式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开会后，规定先制定宪法，代替《临时约法》，然后依宪法选举总统。但袁世凯急不可耐，命令他的党徒制造舆论，欺骗群众说：“宪法产出，需时甚久，若长此无正式负责之元首，对内对外，均属不便。”八月五日，在袁策动下，全国十九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定宪法”。九月初，袁世凯强迫国会先制定“总统选举法”，并于十月六日进行选举。

选举之日，由袁世凯以高价收买的几千名流氓打手、便衣军警自称“公民团”，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吵吵嚷嚷，声言：“非将公民所期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议员们忍饥终日，从早八点到晚十点，投票三次才勉强将袁世凯选上。选举结果宣布后，打手们高呼：“大总统万岁！”一哄而散。

袁世凯利用国会做工具，爬上了正式总统宝座后，就于一九一四年一月下令解散了国会。

孙中山原想以《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

袁世凯上台后，就不断地破坏约法，做正式总统不到一星期，索性召开“约法会议”，公然废除了《临时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这个“袁记约法”用专制独裁取代了《临时约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把袁世凯的权力扩大到和专制皇帝一样。接着，袁又抛出一个《修正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无限期连任，并有权推荐总统继任人。这样，袁世凯就成了“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

通过解散国会，废除约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已经被袁世凯完全破坏了。

随后，他又按照封建王朝的样子改变了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恢复了帝制时代的官名和官阶。这就进一步暴露了袁世凯梦想作皇帝的野心。

袁世凯自窃夺政权后，更从政治上、经济上对人民实行黑暗的反动统治。为了镇压人民反抗，袁世凯连续颁行了《暂行新刑律》以及《戒严法》、《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惩治盗匪执行法》、《出版法》、《报纸条例》等单行法规，不准人民藏有武器，禁止罢工、集会结社及一切革命活动。《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全部被取消。此外，特务组织遍布全国各地，造成一片白色恐怖。

在经济上对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盘剥。大量土地

被大小军阀所兼并，仅袁世凯一家就在河南彰德县霸占了全县三分之一的土地。袁世凯政府的各种捐税比清朝又有大量的增加，如印花税、烟酒税、鸦片税、所得税、巡警税、炮捐等，名目繁多。据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统计，印花税增加六倍，烟税增加三倍，统捐统税增加六十倍。这样穷凶极恶的搜刮，还是入不敷出，一九一三年的财政赤字竟达三亿八千余万元。庞大的军事开支占全国总税收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的赔款和外债压在人民头上。仅一九一三年度偿还的外债额，就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袁世凯政权建立之日起，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在河南更爆发了大规模的白朗起义。起义军不仅提出：“打富济贫”，“建立完美之政府”的口号，进行激烈的反袁斗争；而且还焚烧教堂，严惩传教士，狠狠打击外国侵略者。白朗军转战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五省，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人数由几百人迅速发展为数万人。当时有些同情“二次革命”的进步青年也参加了白朗军，孙中山还曾给白朗写过信。这次起义声势浩大，

袁世凯调动了二十万军队才将它镇压下去。起义虽然不幸失败，但是却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军阀政权的崩溃。

为了复辟帝制，袁世凯一面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一面急于寻求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获得更大的侵略利益，也愿意支持这条走狗恢复帝制。英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时就认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理想，我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德皇曾写给袁世凯一封密信，答应“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欧列强忙于大战，无暇东顾之时，妄图一举独吞中国。日本首先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强占我国青岛。接着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称帝的条件。日本公使日置益在递交条约时，威胁利诱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表示只要袁答应“二十一条”，日本便支持他当皇帝。“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

(1) 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

(2) 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各项特

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筑路和开矿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都延至九十九年。

（3）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

（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别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并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筑权。

这样苛刻的条件，足以使中国灭亡。但袁世凯为了实现当皇帝的美梦，不惜把中国变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竟于五月九日，除第五项外全部承认了这个卖国条约。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人民激愤万分，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上海各界人民组织“反日同志会”，号召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勿忘国耻。

当卖国条约的签字消息透露后，全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上海工人首先奋起反抗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各地日资企业工人也掀起了更加猛烈的斗争。东北本溪煤铁公司工人则举行罢工，反对日本侵略者。北京、汉口等地人民不顾反动势力的镇压，纷纷散发传单，举行

反日爱国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和爱国人士也聚众集会，发表演说，演出抗日戏剧，或“刺血上书”，或“断指自誓”，表示中国人民势不可侮的坚强爱国精神。商界也组织了排斥日货同盟。海外华侨纷纷通电谴责卖国政府，提出：“要想御侮，必先惩国贼”的正义要求。

全国人民拒绝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3. 短命的“洪宪皇帝”

袁世凯反动统治，由于面临着辛亥革命后日益觉醒和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从一开始就是极不稳固的。为了维护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大野心家袁世凯迫切需要权力更加集中的统治形式——君主专制制度，以便迅速及时地镇压人民反抗。因此在他当上“终身总统”后，便加紧帝制活动，以实现其子孙万代的世袭统治。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加紧投靠帝国主义、镇压人民反抗和消灭民主势力，还利用孔孟之道，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

袁世凯一上台，就在北京教育会议上提出祀孔问题，因革命党人的反对而被否决。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凯指使地方反动势力组织“孔社”，对抗进步舆论，并亲派秘书参加“孔社”成立大会，宣读他的祝词。同年六月，又发布尊孔令，宣扬孔老二的复辟倒退的反动谬论，并要恢复祀孔典礼，遭到全国舆论反对。在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于十一月竟公然指使宪法委员会提出“以孔教为国教案”。该会迫于全国舆论的愤怒谴责，未敢通过这一提案。一九一四年一月，又经过他的御用机关“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案。九月，袁世凯亲率百官，身穿古怪祭服，到孔庙朝圣。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尊孔组织，教育部下令各地学校尊孔读经，各省官吏纷纷主持祀孔典礼。一时，尊孔妖风四起。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袁世凯极力宣扬儒家的八德，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是反动的封建道德，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思想武器，袁世凯却把它称为“人道之大经”，“人群秩序之常”，甚至说什么“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妄图抹煞伦理道德的阶级性，把封建的伦理道德吹捧成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借以毒害人民，使之只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任其宰割，听其帝制自为。